

冀鲁豫党史研究

资料

(6)

要目

晁哲甫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在济南举行

继承与发扬老区教育传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学习邓选第三卷的一点体会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是富农之路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千口村发展经济的启示

冀鲁豫边区交通邮政概述与研究

抗日战争前期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研究会编

1995

冀鲁豫党史研究资料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研究会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印刷所印刷
16开15万字 1995年4月印刷
印数1—500
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
冀出内准字〔1995〕第0033号

D239
103:6

目 录

-
- 晁哲甫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在济南举行 (1)
- 继承与发扬老区教育传统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张承先 (3)
- 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 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 学习邓选第三卷的一点体会 王传忠 (6)
-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是富农之路
-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千口村发展经济的启示 孙建岭 (8)
- 冀鲁豫边区交通邮政概述与研究 刘鸣九 贺志刚遗稿 (10)
- 南阳湖东地区的三次开辟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谷传光 (13)
- 抗日战争前期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 张增林 (18)
- 微山湖区党政武装向湖西转移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谷传光 (22)
- 浅析高唐县谷官屯暴动失败原因 张金洪 (26)
- 关于“直南特委游击第二支队”访谈纪要 孙建岭 (30)
- 《战地草》读后 李运亨 (33)
- 抢搭舟桥 王书桂 (35)
- 抗日战场上的一支文艺轻骑兵
- 八路军筑先纵队娃娃冲锋剧团 李笃才 (37)
- 苏鲁豫皖边区人民在民主革命时期并肩战斗 王继义 (40)
- 猛士如云唱大风
- 沛县人民的武装起义及历史贡献 独道生 魏 钦 (42)

淮海战役中微山湖区的支前工作	谷传光 李延法 李金陵 (46)
碎忆张霖之同志	李寿彭 (51)
忠诚实干 一片丹心	
——深切怀念鹿渠清同志	王传忠 (53)
怀念我们的校长巩固	常杰民 (54)
留取丹心照汗青	
——记王建屏烈士	张金洪 (56)
隐剑虎穴迎黎明	任跃庭 (59)
光辉的人生	
——记中共唐南县委书记李恩庆	张金洪 (64)
毛泽东关心农民吃粮——	
一起谋杀毛泽东的反革命案	(66)
少奇同志给我们讲故事	(67)
俄罗斯汉学家对邓小平的评价——	
邓小平游北京	(68)
邓小平五次香港行	(69)
毛泽东诗词二首——	
李先念病床上念念不忘扶贫	(70)
杨得志同志简介	(71)
范筑先将军简介	(72)
马霄鹏同志简介	(73)

晁哲甫同志诞辰100周年 纪念会在济南举行

《晁哲甫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1994年12月19日9时，在山东大学科学馆隆重举行。会标正中，悬挂着晁哲甫巨幅遗像。馆内，展出了晁哲甫生前的照片，手稿、日记、诗词、书法、任命书、烈士证和清丰县1988年5月敬立的《晁哲甫同志纪念碑》碑文。

从8点开始，七、八十岁高龄的老领导、老战友、老同志，驻济南的有关教授、学者、亲属，以及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教委、省党史研究室、山东大学的代表，共200多人，先后冒雪到会。报告厅坐无虚席，十分热烈。

会场前排就坐的有段君毅、赵健民、谭启龙、高克亭、秦和珍、穆林、王维群、张竹生、张敬焘、徐雷健、刘鹏、周星夫、丁方明、林萍、吴富恒、王祖农、李坚、肖寒等同志。张新村夫人刘进、杨节夫人曾淑玉、高明夫人王汉三、晁涌光夫人石磊；晁哲甫家乡——河南省清丰县代表程平原、齐鸿飞，濮阳市党史委代表何富奎，河北省大名师范代表吴希友、邢朝芳、魏新春；晁哲甫的儿子丁杰、葛瑞生夫妇，孙女虹彩、赵兰海夫妇，红丽、李中原夫妇，也应邀到会。

山东大学副校长乔幼梅主持会议，党委书记陈之安致欢迎词。山东省党史研究室主任陈楷宣读了《晁哲甫同志生平》。晁哲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代革命家、教育家。1894年12月生于清丰县六塔集。1920年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3年同教育家谢台臣创办大名省立师范学校。1926年末，参加中国共产党。1970年12月23日，在济南病逝。享年76岁。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生前，他曾任大名师范教务主任、冀南民众抗日救国会主任、县委书记、特委统战部长、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事室主任、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主任、中央党校五部副主任。1944年夏，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枣园和他谈话，第二年作为冀鲁豫边区的党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委常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副省长）、山东分局委员、统战部长，

山东省常务委员、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他把一生贡献给了党和人民。在抵制左倾冒险主义、反对浮夸歪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在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开展统一战线、发展水利事业、生产救灾、爱国卫生，特别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表现了他的无私无畏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和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会上，宣读了河南、河北、北京和云南等地老同志为《纪念会》发来的贺电、贺信和贺联。

郑州岳肖峡、张赤侠、张增敬、张延积的贺电说：晁老是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在创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为政清廉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将光辉后世，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石家庄杨泽江、贾平、李运亨《电贺晁哲甫老师百年冥诞之庆》说：“我师道履清高，讲坛隆盛，春风霭吉，化雨温良，教书育人，桃李芬芳；我师力倡民主办学，教育生产，相互结合，有教无类，广集人才，超人之识，永垂青史；我师早年在党的领导下，愤然革命，唤起民众，团结抗战，主持政务，业绩蜚然，仁风远被，德化旁敷！特专电奉贺，并将长忆高风！”

北京安法乾、范世钧夫妇的贺信说：“纪念晁老百年诞辰，是我们大家的心愿。非常高兴！特函致贺！作为晁老的战友，本应撰文纪念，但因年高，力不从心。祝晁老纪念活动，圆满成功！”

北京王纯、赵长文、段丁波、丁曼、辛培营、杜春生、张松波、吴忠民的贺信说：晁老是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毛主席

席的这段话，对晁老，当之无愧！从大名七师到抗战中的筑先学院，在他的领导下，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我们几个人，在战争年代是他的下级，又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学生的学生。他的一生是育革命之人的一生，是育建设之人的一生，是育园丁之人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人为桃李，永念导师情。

昆明陈桐源寄来《纪念晁哲甫老师诞辰一百周年》贺联一幅：点燃红烛，力效春蚕，勤奋耕耘，培桃育李，高风亮节，传乡里！尽瘁为民，赤心报国，无私奉献，义胆忠肝，美德良操，照后人！

在热烈地掌声中，大家欢迎老领导赵健民、谭启龙、高克亭及其家乡、家属代表讲话：

赵健民代表段君毅、袁振讲话说：纪念晁哲甫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活动，经山东省委批准，意义重大。晁老是我们的前辈，老一代革命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即使他任党务、行政职务期间，他也很愿意主管教育工作，堪称我们党的模范教育家。特别提出晁老的品格是高尚的、有骨气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很值得我们宣传和继承！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定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起来。大大发扬晁老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和重视教育，实事求是，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全心人意为人民服务。

谭启龙讲话说：我有幸参加晁老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已年过八旬，曾与晁老工作、学习四、五年。时间虽短，印象很深。晁老是长者，我很尊敬他。他平易近人，坚持原则，特别重视教育，对山东贡献很大。我将在有生之年，好好学习他。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烈士，没有烈士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未完成的事业，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我们要代代继承下去！

高克亭讲话说：我很愿意参加这个会议。记得晁老抗战前在直南工作时，我到北方局，经王卓如同志介绍，认识了晁老。听说他 1930 年勇敢地抵制了领导让他们在大名搞武装暴动的左倾冒险主义，不怕被开除党籍，保护了党的基层组织，很受人尊敬。晁老有很高的修养。抗日战争任行署主任、解放战争任大区教育厅长，解放后从平原省主席的位子上来山东省任副省长，他坚决服从，毫无怨言；以后又到山东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毫无地位观念。晁老是 1926 年入党的老党员、老资格了，但他从不摆架子，听从分配，平易近人，十分感人。我们今天纪念晁老，就是以他为榜样，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高尚品德，全心人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更大的贡献！

家乡代表齐鸿飞讲话，重点介绍了晁老在家乡人

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和伟大贡献，以及家乡人民十年来缅怀晁哲甫同志的心情和盛况。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家属代表晁虹彩代表全家，对党和人民为晁老举行这么隆重的纪念活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决心继承祖父的遗愿，发扬祖父的优良作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与会同志一致希望：从这次纪念会开始，纪念晁哲甫同志诞辰 100 周年的活动，要在冀鲁豫三省和有关地方继续进行。会后，12 月 20 日，山东电视台放映了《纪念会》的实况，《大众日报》发表了《继承革命传统，培育一代新人——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山东大学联合召开缅怀晁哲甫同志座谈会》的新闻，《济南日报》发表了《山东大学举行晁哲甫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的消息，《老年生活报》1995 年 1 月 12 日发表了《党的模范教育家晁哲甫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在济南举行》的文章。山东大学出版社决定：7 月 1 日前后出版一本《晁哲甫同志纪念文集》。北京、河南、河北以及清丰县、大名师范的同志，分别撰写文稿，提供有关资料，支持把《文集》编好。（刘荫灏）

毛泽东何时提出 “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7 年 4 月 16 日晚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前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当时应邀出席作客的人员中有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将军和夫人韩权华女士。

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主席介绍说：“这位是原国民党东北‘剿匪’上将总司令卫立煌将军。”

卫立煌说：“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过两次。”

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当晚，新华社发了电讯。4 月 17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欢迎酒会的新闻，标题中专门点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周末》3. 4 蒋惕吾荐）

继承与发扬老区教育传统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编者按：1993年3月21日，张承先同志在冀鲁豫边区第一中学校友会第二次理事会上的书面发言，特在此转载。

张承先

社会主义教育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辩证关系。新民主主义教育，为社会主义教育作了理论的与实际的准备，而社会主义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归宿。那种把社会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割裂开来，是不符合中国教育发展实际的，是极为有害的。

在今天的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吸取一切先进的科学成就，又要继承与发扬老区革命教育的优良传统；否则，就可能走这样那样的弯路，使教育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一)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宇宙观的传入，中国在教育领域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共产党人及先进人士，在逐步学习和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后，对于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并为他们所掌握，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进步教育家发表了不少教育文章和教育著作，例如杨贤江在三十年代发表的《教育大纲》，在当时，都

是很有影响的进步教育著作。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中国旧社会的旧教育斗争中，逐步占领了思想阵地与理论阵地。当时，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其基本内容是反共、反人民的。并在学生中贩卖“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思想。自从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各省政府都纷纷颁布《党化教育大纲》，规定以三民主义“去感化具有革命性而误入歧途之青年”，就是指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革命政策、为民族解放事业勇敢奋斗不怕牺牲的青年。具有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革命人士，在教育领域中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使广大青年，一批又一批的在革命教育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仅如此，从五四运动开始，不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教育家积极地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反对旧的封建教育，后来又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起了进步的作用的。例如，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生活教育、乡村建设教育等。这些教育改革家，往往深入某些乡村或工厂积极推行识字运动，或普及文化科学知识，起了进步的作用。特别在他们直接试验的农村或工厂，不少的劳动农民和工人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识字能力和文化程度。在这过程中，无论是在组织学生入学还是在具体教学方法中，都有许多创造，是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的。谁看不到这些方面，谁就不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教育的民族历史遗产。

在肯定这些教育家与教育活动的同时，还必须看到他们教育活动不足的方面。五四运动前夕，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曾经在中国讲演两年零两个月，传播实用主义的社会改良论与教育观。在一些留美学生的极力

推动下,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在五四运动时期就达到了高潮。这些教育改革家,不同程度地受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就不可能正确解决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在教学中正确解决理论与实践、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的关系。同时,这些教育家所进行的教育改革是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就不可能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推动教育的普及运动。

(二)

教育工作区别于宣传工作。任何教育理论与教育主张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地区或一定的学校,才有可能付诸实施。在革命根据地出现以前,还不可能全面展开以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为指导的教育工作。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算起到1949年全国的胜利,长达22年之久,地区先后有22个省的不少地方。在革命根据地,从中央到地方都把教育工作放到很重要的地位。许多干部在斗争中,逐步认识到没有教育工作的胜利,就不可能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1)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在为政治经济服务中,首先要为革命斗争胜利服务、为人民翻身求解放服务。无论是政治学校还是业务训练班,都是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并且把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结合起来。一个革命的干部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并把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在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斗争形势、斗争任务的变化,教育的内容与方法都及时作了调整与改变。从教育体制上来看,国民党地区的教育,一般的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而革命根据地则是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与普通教育。这种变化不是主观的臆造,而是客观形势的要求。从创立革命根据地起,就需要大批干部去开辟工作,大量举办了革命干部学校。干部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又推动了干部的发展和扩大。随着革命根据地发展与巩固的程度,曾经举办了新型正规化的普通教育。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许多学校从教学内容上把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教育结合起来、从办学形式上把政府办学与群众的要求结合起来,使学校有效地为政治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群众把学校看成是自己的学校。总之,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改变教育的形式、内容与方

(2)革命根据地的教育,始终把工农群众看成是教育的主体,和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教育深受工农群众的欢迎。从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到教育的具体实施,从领导到教育干部,都要把工农群众利益放到首位,真正为工农群众办实事,并逐步引导他们从眼前利益看到长远利益、从局部利益看到整体利益,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

工农教育不是孤立的进行,而是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农民群众进行抗战教育、减租减息教育、发展生产战胜灾害和改善生活的教育。那些地区这些工作做得好,那些地区的教育就活跃起来,并且不少地方生产组织和教育组织是结合的,拿起锄头就劳动生产,放下锄头就拿起书本来学习。

(3)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采取群众路线的教育方法。群众路线教育方法的实质,就是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领导必须和群众结合起来,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必须体现这种精神。有些教学内容,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需要、而目前来看一时不可实现的,就不讲或少讲。从教学形式和方法来讲,决不能脱离当前实际盲目追求正规化,而是要尊重群众的意见,使教学方法和实际结合,逐步提高学生的政治、文化与科学水平。一个教育工作者,逐步学会了在工作中,不仅仅是从上级的指示出发,而是密切注视学校和学生情况的变化,采取正确的方法,提高教育的效果。

(4)根据地的教育总的说来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进行教学的,把认识论和教学论统一起来。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的统一。既重视课堂的教学活动,又重视课外的活动,既重视校内的活动,又重视校外的活动,并且尽可能使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当然,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日益完善的过程。

从古到今,任何教育培养人才都是通过两种形式和两种方法进行的,一种学校的形式和方法,一种实际工作锻炼的形式和方法。历史上,不少哲学家和教育家论述了后者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毛泽东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不少是经过学校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不仅在工作中学习,而且在工作完成或完成一段工作之后,都要系统的总结,总结的过程,就是干部提高的过程。经过革命的教育,根据地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教育的干部,不仅满足了当时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解放以后提供了各方

面的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工作。

(三)

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核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设起来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从根本上讲是以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以及发展的程度为主要标志的。马克思认为，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变革的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中，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勒了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同志提出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要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当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而不是单一的经济；既然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代表不同经济利益的人们，就会在思想领域和文化教育中表面出来的。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就是“利益多元化”论，正是反映了这种思想。现在教育工作中，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有人提出“英才教育”、“贵族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应是人民大众的教育。经济富裕后，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应该是提倡的。如果追求豪华生活条件，搞“豪华型”学校，轿车接送孩子，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害无益的。这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要求也是不相容的。

现在，在教育工作中，一方面出现了“希望工程”，不少人为在人民群众中普及教育，捐钱捐物，甚至降低

个人的消费，这是很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一方面，有的人公然提出搞“贵族学校”。这在教育观和价值观上显然是不同的。虽然现在仅仅露出了一些苗头，但还是很值得注意的苗头。在新的历史条件，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教育的人民性。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有分析的吸取前人的经验，包括中国的与外国的，现在的与历史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总结。在总结前人的教育经验中，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更有直接的现实的意义。革命根据地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教育，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使教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条极重要的路线。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天社会主义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当然，根据地教育当时许多具体的做法或办法，今天是不适用的，而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精神、基本经验，仍然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例如，根据地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解放和根据地的建设服务；教育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办学形式统一性多样性的结合；理论与实践、间接知识与直接知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等；都是应该继承与发扬的。那种认为根据地的教育，是游击性的教育，不正规，没有什么可学习与发扬的，这是对根据地教育的误解。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建设我们的新教育。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第四次人大会议上说，当时教育改革中发生若干偏差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对老解放区教育经验很好的继承。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真正的解决，主要是有的同志甚至有的领导同志，对于老解放区的教育，只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而没有深入研究总结其根本经验。最近，由邓小平同志题签，出版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较全面的总结了老解放区教育的经验，是很值得教育工作者一读的书。当然，在学习的时候，要从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发，把继承发扬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根本经验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结合起来，坚持“三个面向”。深化教育改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为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承先同志在京因有重要会议而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他在3月21日亲自向前来的同志交代，代他向大会宣读这篇讲话)

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学习邓选第三卷的一点体会

王传忠

邓选第三卷有关文章中，有十多处反复论述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信念的极端重要性。谈了之后，很受教育和鼓舞，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现就几点初步体会，和同志们共同研究。

一、应将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放在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位置。

理想，是远大奋斗目标，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科学的理想，共同的信念，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应当把它作为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首要任务去对待。《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曾经提出：“从现在起，用三年的时间在全体党员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一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的学习活动。学习要联系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联系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提高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模范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下略）”对此，邓选三卷有许多很深刻的论述。他说：“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邓选三卷190页）他还说：“我们一定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们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邓选三卷110页）他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他们的弱点，而不是强

点。这使他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的理想，即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认为以上几句话把它的重要性已经说得很透彻很清楚了。

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能够更加充分的说明以上论点是十分正确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下，使幼年的党处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但是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党不但没有溃散，反而更加坚定的站稳脚根和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共产党人为什么敢于冒杀头危险继续战斗呢？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激励起来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呢？我们党从建党开始，走过了28年的历程，历尽千辛万苦，推翻了“三座大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我们主要靠的是什么；建国以来，党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奋斗，艰辛探索，胜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使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蒸蒸日上，这又是主要靠的什么呢。这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救国救民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有为人人类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不怕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这就是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进行斗争，最后能够战胜敌人力量的源泉，是一切革命力量的凝聚中心。

二、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依然要胸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和抛弃的。但是近年来由于出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现

实,马列主义面临空前的挑战;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未敛迹,在某些方面还有加剧之势,仍然存在再次泛滥的危险,有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的人,利用深化改革的口号散布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有害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诸如马列主义“过时了”“失败了”等等论调不绝于耳。在一部分人中特别是青年人对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树立坚定的理想,产生了一些误解,片面或错误的理解。认为共产主义是遥远的,现在提它不现实;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不成功的;对共产主义学说失去了信念。现在一讲党的光荣传统、远大目标,就认为“不合时宜”“保守老化”“正统论”等等,抱无所谓的态度。于是,对党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不敢大胆的提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空气谈薄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模糊了,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泛滥,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和深思。

我们党说的共产主义理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来说是最高的价值观,也是不同于其他人的显著特点,共产党人有责任用这一高尚无比的思想,教育人民群众,以克服社会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不良思想作风和传统习俗。诚如《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所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如果在这个现实斗争中不忠诚,不热情,那就是有意无意的背离党的最高理想,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因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必须把共同理想,同各自的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立志改革和建设,艰苦奋斗,踏实工作,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遥远的,但这个信念决不能动摇,如果丢掉了它,我们的民族就会像没有“灵魂”的躯体,迅速腐烂下去,难以救药,最后被霸权主义者践踏,被世人所耻笑。邓小平同志说:“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三、经济改革越深化越要提倡讲理想,当前强调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曾说过:“经济改革越深化,利益格局越是调整,市场作用越是扩大,我们越要提倡讲理想、讲纪律、讲团结,讲大局。”我认为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我们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深化,必然会触动原来所形成的既定的经济关系、利益格局,触动许多

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做到上下同心,统一行动,基础就是共同的理想;这种理想具有多种功能,失去共同理想,就失去了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经济改革深化,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东西,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只有树立科学的理想,才能有效地抵制这些形形色色腐朽思想的侵袭。我们决心不能因为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商品意识,搞市场经济,就模糊和否定党的远大目标,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理想,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精神支柱。一个人如果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他就会奋力拼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甚至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了科学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就能够团结一致,百折不挠,去战胜任何困难,实现共同目标。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比金钱和权势更珍贵;信念的破天,必然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因之,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认真把握这一思想,是贯彻好今后全党工作的重要保证,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所在。

江泽民妙序品鉴

《党的方献》今年第1期载文,1988年,年逾九旬的刘海粟,在上海举办大型画展。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应邀为画展作序,亲自濡墨挥毫写成精美条屏。现将该序原文录下。

序《刘海粟十上黄山画展》

杜甫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说而今七十不稀奇。刘海粟教授年方九三,十上黄山。啸烟霞,抚琴泉。与奇峰对话,临古松长吟。拥抱黄山,人山合一。跳出云海,吞吐黄岳。古所未闻,今亦仅见。更能抒健笔,化情为墨色。打破古今中西界限,尽兴挥洒,蕴藉无穷。为昔日师长立传,今朝良友写真。山笔文辉。公之于众,与国内外朋友,同享神游之乐。谨为小序。

江泽民

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

(吴名响摘 李惠斌文)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是富农之路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千口村发展经济的启示

孙 建 岭

本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军阀的连年混战。官府奇重的苛捐杂税，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日趋破产的境地。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冀南地区却出现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村庄——濮阳县千口村。缘其繁荣的基础，是农产品及小盐生产的商品化。

被誉为深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①赵纪彬，^②1935年对其家乡千口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情况，撰写了《农村破产声中冀南一个繁荣的村庄——花生、小盐生产商品化形成十五年来畸形发展的基础》调查报告（该文最初发表在《天津日报》后收入《农村经济论文集》），比较全面的分析了二、三十年代千口村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繁荣景象。

调查报告首先从千口村所处的“地理条件的特殊性”说明该村有一定发展商品经济的客观条件；接着说明在客观条件作用和主观认识以后出现的“花生栽培的普及”、“小盐制造的发展”及二者逐渐的商品化，形成了该村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三说明由于花生、小盐生产的商品化而导致该村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

千口村位于原河北省南端濮阳县西北隅直、豫西省的濮阳、滑县、内黄三县交叉点上。来自滑县境内的硝河扇面形的绕于村东、北两面，河正中约一华里宽生长芦苇，为有主之田；苇地两旁的河身占全河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盐碱性强，尚不耕种，为无主之田；村之东南、正西及西南三面皆是沙地，几不纳银粮，自清之初，修成枣林，代代相沿；村之再远侧为黄河故道，一片流沙，只生茅草，此占耕地之10倍以上，亦为无主之田。唯村西青沙地，粮产较高，为该村民的谷仓。时全村任其开垦的无主荒地，能占到耕地的20倍以上，这是该村15年间经济畸形繁荣的自然基础。所以赵纪彬的文章开篇便写到：“我相信：十五年来（一九二〇年——一九三五年）我村在全国农村破产浪潮中一帆风顺地走上了畸形的经济繁荣的境界，不能单由地理的特殊条件来说明；但我尤其相信：设我村无此特殊的地理条件，恐亦不会有此十五年的畸形繁荣。”

花生栽培的普及起自1920年以后。在此以前花生的种植“全村不过两三户，为地不过三五亩，且多为小

手业者小商人，在小地块或道旁四角，偶然种植。其目的完全在于炒熟零卖或自行榨油，在附近三数里内挑担推车，换取日用物品。至于地主小规模培植，实绝无仅有”。但自1920年后，花生油忽然成为国际商品，花生价格数倍增长，以卖为目的商品化的花生栽培，便普及于全村，无论贫富之家，不仅都有二分之一左右的耕地栽培花生，还不惜气力开垦无主沙田，扩大种植。于是该村即相随产生了两种有着血缘关系的新的经济组织——商业性质的花生收买行和工业性质的榨油作坊。这两种经济组织将收买的花生不再直接转卖以求小利，而是自行榨油，辗转输出海外，谋取大利。赵纪彬在文章中就花生生产商品化形成的概况时写到：从1920年到1935年，每斤价格从0.024元到0.065元；栽培户从3户到300户；栽培面积从5亩到300亩；交换范围从本村及附近各村三数里内到大名、道口等地经天津输出海外；交换方式从个人推车换油或挎篮零卖到各家合组商行大批运送；油业经营从经营者即生产者与业主到经营者为小股及雇员、业主，生产者与油业分离。由此可以看出10多年来，花生经营由自给转化为商品营利性质的过程。

花生生产的商品化，给该村带来了繁荣生机的景象，正如赵的文章所描述的“故每值冬春，附近十里内外的中小贫农，及远来客商，熙来攘往，充斥街衢，冷落的农村，完全变成了县镇风光”。

小盐制造业的前身是几乎遍及全村的土碱生产，主要供旧式染房及磨房馍店之用。但嗣因价廉质纯的洋碱的侵入、官盐（大盐）价格的日涨，致使土碱销路堵塞和破产农户食用不起大盐而导致转产和食用小盐。

小盐制造业的发展，有一个由先期村中赤贫为“藉以糊口”的生产到后期“富农地主专卖营利事业”生产的变化过程：

1920年以前，数量不大的小盐生产，纯为村中赤贫

^① 见《中共濮阳党史人物传》第8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② 赵纪彬（1905年—1982），原河北省濮阳县千口村（现属河南省内黄县）人。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直南地区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生前为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顾问。

农闲期间的副业。在劳力无处出卖，又在安土重迁的观念支配下，不欲逃荒外出，便利用硝河坡中碱性强的无主荒地客观条件，小规模地生产小盐，于近处行走零销，藉以糊口。

1920年至1927年为小盐生产发展的第二期。因为此期小盐价格已较前增加了6倍，制盐显有利可图，而且土地可自占无主荒地，制盐所需资本轻微，工技简单，唯之不惜辛劳便可生产，而每年收入有达二三百元者。

1927年至1935年为第三期。此期的小盐生产，已升之为纯商品性质的富农地主的专卖营利事业。这是因为盐业生产的明显利益，诱之新旧富农地主积极参与，并最终控制。他们首先以盐地为资本，实行雇工佃田制，坐获大量小盐；再是先期货粮换盐—值春荒缺粮时以高价将粮贷出，小盐盛产时再让以贱价小盐还贷；三是富人合股组织盐行，贱价收买囤积，待价涨而整售外地，其获利每年都在1倍以上。千口村小盐由为糊口求温饱的小规模生产到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尽管受大利者为富裕人家，但中小贫家也有了求生发达之活路。

千口村花生、小盐生产的商品化，不仅促进了该村经济一帆风顺的繁荣和发展，还相随导致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变化：

首先，种植业的调整。因花生栽培的普及，1920年后棉花的种植面积渐减，至三十年代则完全消灭。衣料的来源先是取之成安、临漳一带的棉花自行纺织，继者购于安阳纱厂的棉线，继者直接买洋布。蕃薯因与花生收获期冲突，几乎废弃不种。大红枣乃是该地一大土特产，每年冬末春初，贫农推车外地出卖或易物交换，富人大批运往汉口求取高价。近因花生种植的盛行，便不再费时费力推车外卖，而是交由本村干果盐行代售，余暇从事小盐制造等活计，因为这样经济效益更合算。又枣树生长甚慢，得利多在三五年之后，故10多年来枣之经营无多大发展。小麦及五谷种植，也都因此较前减少一半以上。

再是劳动力由过剩变为不足。1920年以前，千口村与普通农村一样，表现劳力之过剩。穷人多有逃荒山西、察绥等地或走入军队者。而近15年来，因花生和制盐业的发达，外出人员多返故里，直接垦荒、制盐，受益均胜于佃农、雇工之数倍。该村地主富农每年雇工多者上百名，但皆多为外村人，本村的不及十分之一，且多是与富人有着关系之家，除工价外，另有其他报酬。另外表现劳力不足的是放牧人由成年人变成了儿童。该村大面积的硝河坡及黄河故道多生水草，为自然牧场，养殖业尚为发达。只因花生和制盐业的忙迫，壮人无暇放牧。从前半数以上的成年牧人，如今全为儿童和少数体弱老年人。赵纪彬的文章这样写到：“年来夕阳落山的时候，

虽有成百的驴牛骡马，但牧人早由壮丁变成了十五岁以下的儿童。”

三是村政权易人—商人阶级掌握村政。原由旧知识分子、家族长及一小部分地主掌握的村政权，随着经济的发达，渐次转于经营花生、小盐业真实主人的手中。因为不经营商业者，都因贫困化丧失了固有权威。这些经营商业的人，一方面是村政管理者，同时又是花生、盐枣的收买者、放款人和粮食出卖者。其结果是千口村近年来的村政中心，已由秀才举人及家族长的宅第，转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贷者所组织的三位一体的商店之中。

四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消费的提高。该村因商品经济发展，使多数人家得到经济利益，因此，致富者达数十家。他们由10年前的贫农变为当今的楼房矗立、骡马俱全的富户。因制盐而由穷变富的已在30户以上，他们或购田建房，或转营他业，均达家给人足的水平。另者，由于商品的发达；经济的繁荣，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欲望。文章说：“许多农民—几乎是青年农民的全部，都有了吸纸烟的习惯，且大有非洋布不穿之势。妇女们一中年以下，穿新式洋袜者占百分之五十以上。买饭渡日的人们，约占五百左右（占全人口六分之一）。”半个世纪以前，地处省县边缘的僻壤穷乡，在当时广大农村日趋破产、经济颓废的景况下，竟能一帆风顺的繁荣起来，实属特殊，但它确是客观历史事实。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了，无疑又将引起和推动其他方面的良性变化。

千口村发展商品生产，促进经济繁荣的历史，可给以很好地启示：

——要抓发展机遇。千口村的花生和小盐生产之所以能较快发展成为商品性质的生产，主要是看准并抓住了国内、国际比较好的销售市场这个机遇。今天的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为繁荣和发展农村经济提供了较二、三十年代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有利的机遇。要抓住这个机遇，积极开发和利用好本地的各种优势资源，发展商品生产，推动经济的起飞和繁荣。

——经济是促进社会文明和发展的基础。千口村由于经济的发展，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的县镇风光，偏僻、冷落、封闭变得开放了，都市的文明、海外的物质文明开始涌现该村，“洋”字号的日用品（烟、布、袜等）进入了他们的生活。从该村短短十几年间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经济结构及上层建筑等方面发生的一定的变化，虽然是整个社会发展中极微小的变化，但它却反映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经济关系制约着整个社会关系、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下转第13页）

冀鲁豫边区交通邮政概述与研究

刘鸣九
贺志刚遗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的邮政工作是随着党及根据地的发展而创建和健全起来的,冀鲁豫边区是联系华北、华中和中原三大战略地区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炮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交通邮政战线的同志们殚精竭虑、排除万难去完成任务,支援了前线,为打败日本侵略军,打败国民党顽固派,迎接革命胜利而战斗,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残酷的考验,机智灵活,与人民同甘共苦,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任务。十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建国后社会主义的人民邮政奠定了基础。

一、抗战前的党内交通

直南、豫北地区是北方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1922年李震瀛、贺道培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中共北方部的派遣,先后到安阳发展党员。1923年11月又派刚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的杨介人到安阳发展党员,组织红色工会。1925年8月,水东地区的杞县地方委员会成立时,就组织了党内交通,随着农民运动的开展,党组织及时加强了通信联络工作。遵照中共中央1925年4月30日第28号通知,《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指示:“党在秘密行动之下,使本党的印刷物传布到党的群众和深入党外的群众中去,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这种工作在组织上的重要,等于人身上的血脉,血脉之流滞影响于人的生死”。同志们学习时,联系实际,普遍对党内交通工作引起了重视。1926年初春,党中央秘书长王若飞调工人出身的王凯到中央,专搞地下交通工作,担任中央专职长途交通员。中央秘书处处长任作民具体领导工作。王凯到北京是与北方局交通员周振东秘密联系。河南、山东、河北等的交通工作由北方局领导。王凯曾将中央指示密写在《三国演义》书页的字里行间,亲交李大钊,又将李大钊给中央的两封信带回上海,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党组织和党的交通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当瞿秋白提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讨论时,毛泽东、任弼时、罗迈(李维汉)对建立秘密交通发了言。会议决定在党内建立全国性的交通网。1927年10月,根据顺直省委的指示,中共濮阳县委员会成立,在南乐杏园村建立了秘密通信处,在内黄县后化村张怀森、王山兰夫妇家建立了联络站。刘大风、王从吾、陈少敏等领导同志,曾在他家隐蔽和开会。由于过往接头的人多,他家贫困,有几天伙食有困难,王山兰悄悄外出讨饭,也不让隐蔽在他家的同志受饥。1928年6月,萧县县委成立,孙均(孙叔平)任书记,在戴楼戴晓东家设交通站。山东省委委员张干民到鲁西,建立鲁西县委,领导阳谷坡里暴动,省立第三师范党、团负责人张廷焕担任鲁西县委与山东省委的交通工作。由于叛徒王复元、王用章兄弟在1928年“五三”惨案后向敌自首,用“张网守候”的毒计逮捕了省委秘书长何自声,前省委书记邓恩铭,学联负责人朱霄,以及李西山、宋耀亭、杨一辰、刘兆章、张锡元等。1929年4月组建了新省委,刘谦初任书记,由于叛徒李树藩、李松那兄弟的告密,刘谦初被捕。又逮捕了省委交通李宗鲁、徐新

斋。中央巡视员陈谭秋于1928年8月19日未改组了山东临时省委,王进仁任书记。10月,临时省委又遭破坏,交通员王振基及省委宣传部长党维蓉被捕。12月,中央派卢一之来恢复山东省委。1930年2月8日卢一之及省委军委负责人雷晋笙等8人被捕。除杨一辰、何自声等越狱脱逃外,邓恩铭、刘谦初、朱霄、刘兆章、卢一之、雷晋笙等21人,于1931年4月5日在济南就义。中央于1930年3月12日派任国桢来恢复山东临时省委,任国桢任书记。他给中央的报告谈到要建立发行工作。1932年10月中央派任作民来任山东临时省委书记,12月临时省委改为正式省委。1933年3月因任作民等被捕,张恩堂组成临时省委,张任书记,宋鸣时任组织部长。7月2日宋鸣时叛变,逮捕了张恩堂及北方局派来准备重建省委的刘泽如;还逮捕了省委交通马振声、朱光生等。据青岛市委书记李大章给中央的报告,估计这次被捕300余人。由于这次大破坏,山东党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在济南党的领导下鲁西地区的党组织,缜密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通过秘密交通,恢复和发展党组织。1934年春,赵健民含辛茹苦、四方奔走进行秘密串连。他通过济南一乡师学生刘莱夫与莱芜县党的负责人刘仲莹取得联系。1935年10月,全省组织起来的党员已达500多人。12月,赵健民在濮县徐庄见到了中共河北省代表黎玉。不久,北方局肯定了中共山东省工委的工作,任命黎玉为山东省委书记,并建立和加强了党内交通,调孙锡恩、徐宾到省委当交通员。

陈少敏是河北省委的妇女代表,于1934年9月派到直南特委工作,后任直鲁豫特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她非常重视女交通员的培育工作,在马集村培养了王秀花等成为红交通。反动派多次悬赏通缉“大脚老方”(陈少敏),她机智地在堡垒户和交通员的掩护下脱险。徐州地区的党组织几经破坏,在枣庄矿区的郭子化,先后串连秘密与沛县、萧县、铜山、永城、邳县、睢宁、泗县等不少党组织接上关系。1935年2月,苏鲁边临时特委正式成立,郭子化任书记。为了寻找上级党,特委派郭日高去西安与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联系。郭日高缺路费,忍饥挨饿讨饭到了西安,将郭子化的亲笔信交给老同学宋绮云,从此苏鲁边特委与上级党接上了关系。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交通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在外地的党员先后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带来了各地革命斗争与交通工作的丰富经验。1937年11月,鲁西特委和鲁西北特委合并,成立新的鲁西特委。山东省委到鲁西特委的交通由刘晏春、马功臣负责。10月,直南临时特委成立,马宝寅、杜茂林、李贤负责交通工作。11月,苏鲁豫特委书记王文彬领导和创建了湖西秘密交通线。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在党的感召下,毅然拒绝南撤的命令。1938年3月,鲁西特委派成润等去延安汇报,带去了范筑先给毛泽东、朱德的信。不久,成润带来朱德给范筑先的复信。9月,黎玉、张经武从延安带了近200人的干部大队回山东。黎玉将毛泽东的亲笔信交范筑先。他读信后深受鼓舞,激动地说:“当今之世,要救中国,要想不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

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二九师津浦支队挺进鲁西北;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到达直南、豫北,有力地稳定和发展的当地抗日形势。3月20日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在南宫县成立,当时交通工作主要由各机关秘书和秘书长领导。1939年1月15日,鲁西区党委在馆陶县成立,区党委设交通科,科长裴毓明。1939年冬,泰西专署在肥城境内建立了泰西中心交通站,周济任站长、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于1940年4月18日成立,区党委设交通科,科长张恩桐。副科长窦耀田。敌军实施“治安肃正”计划,进行大规模“扫荡”。1940年12月,鲁西区党委交通科长王品一被敌杀害,副科长贺虎(贺志刚)主持交通工作。1941年7月1日,北方局集总决定,湖西归山东分局领导,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行署合并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和行署,区党委交通科长刘鸣九,副科长贺虎(贺志刚)。1942年初,建立起4条交通线:1、濮县、范县、观城的中心交通线,通往各地委;2、通往北方局和集总;3、通往山东分局;4、湖西交通线直通山东分局。1941年林县任村设立了八路军豫北办事处,1942年初,在内黄井店设立沙区办事处,王乐亭任主任,成功地建立起两条穿越平汉铁路的地下交通线。先后秘密带路和护送数千名干部和抗日青年安全通过敌封锁线。其中有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朱瑞、杨勇、肖华等领导人。吕正操率冀中部队约5000人,曾由此顺利通过平汉路。早在1938年10月,在夏镇建立地下交通站,沟通鲁南与湖西的联系。1940年建立微湖游击队和湖西交通线。11月,沛滕边被敌占领,湖上交通中断。1942年5月,恢复了湖西地下交通。7月底,护送刘少奇从鲁南到沛滕边。8月中旬,微湖大队正式建立,先后出色完成了护送陈毅、朱瑞、肖华等领导同志和大批过路干部的任务。1943年春,建立滑县、浚县、汤阴、淇县、汲县、延津、封邱等七县办事处,开辟南线地下交通,全长约百余公里,由东向西经卫南、延津、汲县过卫河、跨铁路到太行。七县办事处设交通股,股长冯占林,先后护送来往干部约3000余人,其中有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罗荣桓、徐向前、滕代远等领导干部。

1941年、1942年是国际法西斯最为猖獗的时期,随

着日军回师华北,对冀鲁豫的蚕食、“扫荡”日益频繁,在1940年55次“扫荡”、4·12“扫荡”之后,1942年9·27进行大规模“扫荡”,日伪军出动1万余人,坦克10余辆合围“扫荡”濮范观中心区,部分武装和群众遭受损失,部分同志被俘和牺牲。区党委交通科遂显亭被俘,宋仁轩牺牲,区交通总局的班明柱被活埋。遂显亭等被俘后押送到济南,党员们秘密串联,在狱中组织暴动,越狱成功,得到军区表扬。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地方封建势力进行反共活动,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对顽军的进攻我们党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冀鲁豫在敌、伪、顽、会、匪夹击的严重形势下,边区党组织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多次取得了反“扫荡”和反顽自卫斗争的胜利,不少交通战线的同志在极其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涌现出不少铁骨铮铮的英雄。如区党委交通科的巡视员万天瑞(万怀士)被捕后经受毒打酷刑,他守口如瓶,绑赴刑场时,昂首挺胸,视死如归,高喊革命口号,被活埋时年仅22岁。女英雄赵吉兰被捕后受尽酷刑,割去乳房仍不屈服,牺牲时38岁,群众称她是视死如归的女英雄。交通一分局副局长苏松柏(苏树仁)被捕推上铡刀逼供,他面不变色,严守机密。敌人将他铡死三段,悬首示众,群众趁夜里人静将遗体运回家乡安葬。东明县交通局局长孙自端被捕后,受尽了酷刑,宁折不弯。暴敌将他剖腹开膛,群众称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1944年冀鲁豫、冀南两地区合并,加强了对敌斗争,扩大根据地,交通发行机构合并,调整了交通干线。全区设五大干线,分设12个交通分局,116个县局。下面设交通站,形成了交通网络。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冀鲁豫军民不失时机对拒不投降之敌展开全面反攻,迅猛地扩大了解放区。交通部门努力为接管新区的邮政作好必要的准备。

三、解放战争时期调整加强交通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由民族斗争为主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主。冀鲁豫纵横千里均已解放。交通邮政线路和机构迅猛扩大与发展。1945年10月,冀鲁豫与冀南分开,明确裴毓明为冀鲁豫交通局长,刘鸣九为副局长。11月,晋冀鲁豫交通总局在武安龙泉村召开第一次冀鲁豫、太行、太岳、冀南区交通局长会议,决定统一实行邮票制度,迅速接管已经解放的城市里的中华邮局,建立健全各级交通机构。1946年3月1日,冀鲁豫行署布告,任命刘鸣九为冀鲁豫区邮政管理局局长,于秀民为副局长。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万主力部队,于1946年6月冒天下之大不韪,围攻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7月初,晋冀鲁豫军区军邮局成立,陈墨然任局长。因军邮初创得到行署主任、后方总指挥部司令员段君毅的大力支持,人们亲切尊称段君毅为“段军邮”。9月21日,晋冀鲁豫边区邮务管理总局任命陈墨然为军邮视导员兼十五随军军邮局长。根据后方总指挥部的命令,在支前民工的行军路线上,每隔20到30里设有休息站,每隔50到60里设宿营站,每隔100里到120里设转运站,这些对军邮提供了很多方便。在野战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大拉锯”情

况下，邮政和军邮密切配合，保证了前方部队文件、信函、报刊等的及时传送。

1946年下半年，解放军先后放弃冀鲁豫34个县，换取了歼敌20个旅的重大胜利。1947年1月1日至2月29日刘、邓野战军在巨、金、鱼战役和豫皖边战役中歼敌4万余人，先后收复县城14座，鲁西南和湖西大部重获解放。在敌占区迅速加强了党内交通工作，建立起秘密交通线、联络站。1947年初，在黄河南敌我大拉锯的残酷环境中，组织了武装交通。3月8日区党委号召，深入开展立功运动。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得到表扬的有：“军邮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困难，将报纸、书刊和信件迅速准确送往前方。”“宋文法、左凤仙、陈建平等，1947年4月6日送文件；在淇县遇敌，勇敢冲杀歼敌一部，俘敌6名，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3支、子弹600余发，受到刘邓大军政治部通令嘉奖”；“晋冀鲁豫边区邮务管理总局给冀鲁豫区邮政管理局记大功一次”等等。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敌卷土重来时，黄河以南各县一度被敌侵占。为了坚持就地斗争，粉碎敌人“清剿”、“扫荡”，平原的地道逐步成为分散坚持游击的重要依托。邮政、交通部门建夹壁墙，挖地洞、地道藏文件，掩护过往的同志，坚持通讯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考城县交通局长吕全章发现还乡团抢粮，就利用地道安排群众转移，又带领交通员阻击还乡团，制止了抢粮。12月下旬鱼台170余武工队员在周堂中心地道坚持御敌，毙伤敌数百人，终因寡不敌众，除44人挖秘密出口冲出外，其余武工队员及交通员吴秀真等均在地道里壮烈牺牲。1948年邱清泉等部蒋军，与地方反动武装、还乡团进行大规模“扫荡”、屠杀、掠夺，称为“风搅雪”对解放区推行“三光”政策。交通邮政是敌人的“眼中钉”，斗争十分剧烈、残酷，不少同志为邮政交通工作而捐躯。如：通许县联络站李泽润（毛凤林）站长，被敌包围，腿中弹，被捕前将公文包等迅速埋藏。他被毒打逼供，坚贞不屈，光荣牺牲；原交通五分局局长杨芳江，后调菏泽当县长，“扫荡”时与敌作战，见交通局同志被敌堵在地道用烟熏，杨芳江带武工队来解救，不幸中弹牺牲。1948年7月15日，陇海支局局长邱建元、司务长刘世禄，临河站站长赵启清，副站长鲍洪海在渡河时，木船被炸牺牲，杜春堂等8位同志负伤。被炸后，刘鸣九局长到现场处理善后，传达行署要求迅速恢复邮路的指示，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日以继夜接通了邮路，被誉为“炸不断的临河一站黄河渡口”。考城交通班长谢世德、交通员张玉合于1948年2月有一天拂晓前送急信，朦胧中看见前面敌人众多，步履匆匆。他俩分析敌人企图奔袭包围我机关部队，就鸣枪报警。敌措手不及，又不明真相，立即盲目地用机枪、步枪还击，20分钟后全撤走。住在附近槐槐村的考城县委等机关闻枪声紧急转移，避免了损失。党委决定给张玉合记一等功，火线入党；给党员谢世德班长也记一等功。我军攻打开封时，开封地下党和情报站，事前将搜集到的敌《开封城防图》等重要情报，由地下交通及时送攻城部队。后来只用5天时间，就攻克了开封，受到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司令部的表扬。

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胜

利结束，歼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冀鲁豫先后出动民工30余万，邮政系统全力以赴支援军邮，配合部队搞好交通联络，支援前线。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家王朝覆灭，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邮政、交通广大员工纷纷请求南下。1949年8月总干线的邮运均改为汽车运输，工效大大提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交通邮政工作迈开大步为创建社会主义的人民邮政，逐步实现企业化而努力奋斗。冀鲁豫参加开国大典的老交通有滑县的女英雄李秀贞。她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多次立了大功。先后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代表会议、全国妇代会、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交通、邮政战线的同志们，在硝烟弥漫、生活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坚持党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出生入死，顽强战斗，机智勇敢，神出鬼没，建立起摧不毁、割不断的交通邮政线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斗争是极其尖锐的，敌人对我交通、邮政工作千方百计破坏，摧毁我交通邮政机构，杀害我交通邮政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冀鲁豫交通邮政人员光荣牺牲的有516名。现经征集史料，座谈研究，总结出冀鲁豫边区交通、邮政工作取得成绩的主要经验有：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交通、邮政系统必须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重视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各支部定期向上级党委请示汇报工作，想尽办法，从全局出发，坚决克服困难，才能保证完成任务。

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战胜敌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交通、邮政员工经常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在敌“扫荡”和追捕时，不少交通员是在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的保护下脱险的。我们的地下交通站、联络点，都是领先群众的支持才能站住脚、开展工作，如果脱离群众，就寸步难行，一事无成。

三、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胆大心细，机智灵活、力争以智取胜。冀鲁豫地区敌情的特点是敌、伪、顽、会、匪势力犬牙交错，必须认真分析，利用矛盾，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并结合军事斗争，以及统战、敌工等工作，依靠党组织，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因而在敌眼皮下建立起不少地下交通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交通、邮政机构要有合有分，有明有暗，有增有减，及时调整，方式方法要多种多样，机智多变。千万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脱离实际。

四、随时注意进行多种方式的宣传教育、注意培养和选拔优秀人员，充实交通、邮政队伍，提高其素质和工作能力。利用战争间隙办培训班和学校，既学革命理论、政治形势，还学习军事、文化和业务。学员们知道学习的机会难得，情绪高、不怕苦，积极主动，有紧迫感和使命感。同时还集思广益，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提高认识和学习效果。

（汤之驹整理）

南阳湖东地区的三次开辟 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谷 传 光

南阳湖东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称邹西，它处于兖（州）、济（宁）、邹（县）、鱼（台）、滕（县），五县的结合部，包括今属微山县的南阳、鲁桥、马坡、两城等乡镇和邹县的一部分。这一地区东临津浦铁路，西南两面分靠南阳湖和独山湖，白马河、泗河两大河流从境内穿过，依山傍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地区。

一、中共邹西县委建立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四大队越湖东进。

早在1932年，南阳湖东地区就开始有了党的活动。1932年7月，中共党员韩维密奉山东省委的指示回邹县（包括邹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从1932年到抗战初期，在南阳湖东地区，刘仲民（两城小庄人）、吴华民（马坡吴庙人）、董毓炳（两城薄梁人）、盛铁如（马

坡盛楼人）、张文香（鲁桥枣林人）、董宜亭（两城薄梁人）、杨金春（两城人）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中共邹县县委在邹西重新建立。县委研究确定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等项任务。不久，由县委组织委员冯起主持恢复了鲁桥、马坡、两城一带盛铁如、吴华民、董毓炳、刘仲民等人的组织关系，这些同志在邹县县委的领导下，秘密建立发展基层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邹西第一个县委——中共邹（县）西县委，（亦称兖济邹鱼县委）隶属中共邹滕峰工委领导，7月划归湖边地委领导，县委书记丁平，组织部长盛稼夫，宣传部长王文清，民运部长崔北海（化名丁涛），武装部长郑西琴，鲁桥、两城、马坡、南阳、郭里集等地的党组织隶属

（上接第9页）要显示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否则，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名空话。

——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必须克服小农经济思想观念。千口村在当时农村破产声中虽然发展了商品生产，繁荣了经济，但仍没有摆脱小农经济观念的束缚。那时在花生、油料、小盐都有一个比较好的销售市场的机遇中，本应有更好的发展，更大的繁荣。但千口村没有能作到，其中原因之一恰如赵纪彬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农民在观念上决不愿自己成为粮食购买者，为保持其卖花生不买粮食的地位，多自动留耕地之一部，专种五谷。”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是小农经济固有特性的反映。当然，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地主富农经济剥削和官税杂捐压榨的大环境下，小农经济大量破产，农民生活尚且贫困，有着“不种五谷，断去生活后路”之忧，自然没有大力大量发展商品生产的基础和条件。

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繁荣和发展民族经济有了可靠的政治保证，为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条件。但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基础上的新中国，仍不可避免地残留着小农经济派生出来的思想观念，它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障碍因素。必须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克服和解决小农经济观念，建立大商品生产意识，才能促进和不断提高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当然，小农经济观念的克服，又必须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水平的提高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它们是互为因果关系。

——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仅有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是不能保证社会健康发展。彼时的千口村经济一度发展繁荣之后，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不仅有物质方面的渴求，而且由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一些人染上社会上的恶习，质朴的社会风俗遭到破坏，赌博和淫荡风流坏习也曾发展起来。村上不事生产，游手好闲者近300人。这种腐败现象，是那时社会制度的反映，也是不好医治的顽症。解放初期，党中央为根治腐败现象，曾采取重要措施，重处了一些使全党、全国为之一震的首恶者，教育改造了大批染有各种恶劣习惯的人。然而，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商品生产的发展，经济的活跃，一些一度被根除了的腐朽的东西又有复活，严重腐蚀一些人的心灵，扰乱社会秩序，妨碍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教育和法制彻底解决。只有保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和前进，社会主义农村经济才能真正繁荣。

1994年8月

（作者：中共濮阳市党史工委副主任、副研究员。）